

論社会主义的失敗

(供內部參考)

论社会主义的失败

〔美〕伊斯门 著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供内部参考)

论社会主义的失败

〔美〕伊斯门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3017·91

1965年9月初版

开本 850×1168¹/₃₂

196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77千字

印张 3⁹/₁₆

印数 1—1,000册

定价 (9) 0.48元

出版說明

本书作者馬克斯·伊斯門(Max Eastman, 1883—) 是美国作家, 1913—1917 年担任《群众》杂志編輯, 1918—1922 年担任《解放者》杂志編輯。他曾加入共产党, 于 1922 年赴苏联住了一年多的时间, 旋即变成叛徒, 发表一本又一本的著作, 如《俄国社会主义的末日》(The End of Socialism in Russia)、《馬克思主义是科学嗎?》(Marxism: Is It a Science) 等, 对馬克思主义和列宁、斯大林在世时期的苏联进行恶毒的攻击。

这本《論社会主义的失敗》(Reflections on the Failure of Socialism) 于 1955 年由紐約德文-阿德尔公司 (The Devin-Adair Co.) 出版, 并在 1955 和 1962 年分別印行了第二版和第三版。作者在这本书里誣蔑斯大林是专制暴君, 并对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进行了卑鄙无耻的人身攻击。在最后一章里, 他甚至还嫌馬歇尔、杜魯門之流美帝国主义反动头子的对外政策过分軟弱, 叫囂要以武力来消灭共产主义。所有这一切充分暴露了这个卖身投靠垄断資本的叛徒的丑恶嘴臉。我們現在把这本书翻譯出版, 供內部参考。

商务印书館編輯部

目 录

自传性的导言·····	1
-------------	---

第 一 部 分

第 一 章 两种希望都是虛假的·····	15
第 二 章 自由与计划經濟·····	20
第 三 章 自由的真正的保证·····	27
第 四 章 我們破灭的幻想的更替·····	35
第 五 章 失职的自由主义者·····	45
第 六 章 你是个什么“派”? ·····	56
第 七 章 反道德主义的宗教·····	66
第 八 章 馬克思与馬基雅弗利·····	74

第 二 部 分

第 九 章 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它的奇怪經歷·····	76
第 十 章 社会主义和人性·····	81
第十一章 不要杀鹅取卵·····	91
参考书目·····	107

自传性的导言

讀这本书的人可能会納悶，我怎么会得出社会主义已經失敗这样的看法。我要在另一本书里叙述整个經歷，不过在这里，略为看一看我在思想上所走过的道路，也許是有好处的。这条道路并不像有些人可能設想的那样曲折。

我于1916年在《群众》杂志上发表的两篇文章里曾經表白过我的政治活动的目的：不是要改造人，甚至主要不在于改造世界，而是要“使一切人尽可能自由地生活，自由地理解世界”。在这一点上，岁月并没有使我改变自己的想法。

在那两篇文章里，我把馬克思的哲学体系，也就是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結果这种看法，当作“他的願望的一种合理解释”而没有加以认真考虑；我說：“我們必須变更和修改他的著述，使他的著述和近代科学所提供的其他內容成为一种显然具有假設性质的学說。”

按照我的想法，这个假設是：通过加强工人階級的斗争，用投票或革命的方式把斗争进行到取得胜利为止，我們就能“使生产資料社会化，”从而把民主从政治領域扩大到經濟領域。我认为，这就可以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来建立生活。用一个我曾經喜欢引用的馬克思的公式來說，这就可以“解放无产階級，从而解放整个社会”。

总之，据我看来，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历史哲学或人生哲学——更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项大規模的关于社会的科学实验。我得出这样的結論，倒不是单凭情感，而是通过思考的过程的。我没

有个人的嫉妒或憤懣；我的处境順遂，受过良好教育；我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我願意使所有的人都得到这种自由；我願意看到沒有等級、階級、种族、貧富等差別——沒有剝削、沒有“工資制度”的社会。我知道，这是不能依靠說教来实现的，因为我已看到了說教的效果。这时，我迷恋这样一种想法，认为那些在現制度下最受剝削的人为本身利益而进行斗争，就可能促成这种社会的到来。因此，**階級斗争这种方法就成了我的社会主义信仰的中心内容**。上面提到的那两篇文章是以《走向自由，前进的方法》(Towards Liberty, The Method of Progress)为題的，当时打算用来作为一本书的开头两章。

我那时設想，整个人类——尤其是把本身截然分成两半的时候——能够把一整个历史时期变成一次科学实验，这种設想实在是很幼稚的。科学需要一位科学家，至少也需要一位工程师，而就这个问题来说，那个工程师非具有独裁的权力不可。但是，那时候这种想法即使钻进了我的脑海，我也設法把它躲开了。我拟訂了自己的一套社会主义，它使我对妇女权利、人口控制、和平与战争等許多具体问题，都能持独立的見解。無論是階級道德的学說或是階級仇恨的宣传，我都置之不理。我能够自由地考虑这类问题，因为我那套社会主义不是神秘的万灵药，而仅仅是一个我认为切实可行的計劃，能够用来解决使自由更加普遍和民主制度更加民主这一具体问题。

虽然我以前是社会党党员，但我从1912到1922年主編的《群众》和《解放者》这两种杂志却負有立場独立的恶名。社会党的負責人員为了这样或那样的异端邪說，經常对我大加撻伐。那一般都是革命性的异端邪說。当时我在社会党的光譜中肯定是站在紅色的那一端。然而，我所攻击的倒也并非总是那些有別于革命者

的改良主义者。我所攻击的往往是这两种人的教条主义。我既然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改变成一种实验性的科学，自然要对社会党那些圣职人员的顽固不化、八股文章和无所不知主义一再开战。我想，这一点是早先的《群众》^①和《解放者》方针上的特色，正如它也是这两种杂志勇于坚持阶级斗争的特色一样。我经常和“世界产业工会”保持着密切关系，甚至同无政府主义者也友好相处，尽管我批评他们对方法所抱的概念过于天真。我对不是指自由党党员而言的自由主义者这个名词也没有什么畏惧，尽管我对这个词有自己的解释。“抱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是这样一种人，”我在1917年9月份的《群众》杂志上写道，“他能够设想自己相信任何事情。只有这种人才能够判断各种信仰，才能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执迷不悟。”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使所有那些持有进步的甚至温和的社会主义见解的人大为震惊，这时我在《解放者》杂志上极力支持了布尔什维克。我筹措了一笔把约翰·李德^②送往俄国去的款项，并且发表了他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编辑成《震撼世界的十天》这一本著名的书。在那些狂暴的日子里，我大概是唯一没有被投入监狱的“赤色分子”，有一个时期，我主编的这本杂志是如实地提供俄国消息的唯一来源。它的发行量达到了六万份的高峰。

列宁那本英文名字叫做《苏维埃在工作中》(The Soviets at

① 我使用“早先的”这个词来把《群众》和《新群众》区别开，《新群众》是若干年后由完全不同的一些人创办的。这个杂志受共产党的控制，所阐明的方针几乎在一切细节上都和《群众》与《解放者》的主张不同。我在《生活的享受》(Enjoyment of Living)一书第415页上比较详细地谈论了这件事情。

② 约翰·李德(John Reed, 1887—1920)，美国新闻记者和诗人，曾任《群众》杂志编辑。——译者

Work) 的小册子出版时——就是使惠塔克·錢伯斯 (Whittaker Chambers) 信仰了共产主义的那一本——我大喜若狂。列宁的思想非常讲求实际, 絕對实事求是, 再加上他几乎是前人所未有的那样热情洋溢地关怀受压迫的貧苦人民, 惦记着他們的自由, 一心一意要他們参与政权, 凡此种种都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至今还认为这本小册子是最伟大的——現在則是最可悲的——政治文件之一。这本小册子使我深信, 列宁的思想是实验性的。在每一行文字里他似乎都实现了我对一个科学革命家所抱的理想。我在《解放者》杂志的两篇文章里欢呼他为“新型的政治家”, 并且在理論上毫无保留地致力于捍卫他的行动准则和他的苏維埃政权。

我攻击那些責备他犯有教条主义的人的时候, 曾經大声疾呼地說: “在列宁的任何演說和文章中, 我从来没有看到什么迹象, 說明他不是把馬克思的理論当作純粹是证实过程中的科学假設的。”

那时候从俄文翻譯过来的东西很少。我不得不亲自到俄国去并且学习了俄語, 才發現列宁是馬克思神秘理論的真正信仰者。确实, 他对它的那些論点要比任何其他的信仰者都武断一些——比起托洛茨基来尤其是如此。正像有一回卡尔·拉狄克对我說的那样, 列宁有一种手法, 能够“根据事实决定一个問題, 然后再使这个問題和理論結合起来”。他还用黑格尔的“辯证邏輯”观念来帮助他玩弄这种手法。那时候, 我知道的还不够多, 分不清这种巧妙的观念所給予信徒們的自由是有限的, 而仅只考虑事实、目的和行动計劃的头脑所享有的自由才是完全的。我对列宁的充分信賴, 超过了对于任何其他領袖, 我运用我的呼声和杂志所具有的全部影响, 在美国輿論界的戰場上为布尔什維克而战斗。从十月革命开始, 到弗兰格尔男爵被逐出克里米亚为止, 我参与了一場內战, 我的社会主义信仰变得坚定不移了。在这以后, 經過了很長的时间,

由于得不到解答的反面事实的一系列无情的轰击，这种信仰才有所动摇。

然而，我絕不是盲目信仰的，我在 1922 年乘船去俄国的时候，曾經对朋友們說，我要“到那里去看一看，我一向所說的話是不是正确的”。我是 9 月里到达的，在出席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前，刚好有时间学习一点俄文。我不是代表，沒有正式的身分，不过，《解放者》是相当出名的杂志，所以我还是像一个客人那样受到热情款待。后来，托洛茨基（他答应协助我写一本传记）给了我一份非同小可的证件，上面有他的签名和紅軍的图章，要求俄国的每一个人都热情地接待我和注意我的需要。我拿着这份证件，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要看什么就看什么。

我到处去旅行的时候，正好是在新經濟政策实施以后的飞速恢复期間，我经历了最美好的苏維埃生活。这种試驗的某些特点使我感到駭异和震惊，但我还是有理由抱着很大的希望。依我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糟糕透頂的。那就是圍繞着馬克思主义的聖經滋长起来的頑固不化和拜占廷式的經院哲学。黑格尔、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諾夫、列宁等人的书籍，对布尔什維克來說，就是人类知識的最高权威。这些书籍不是科学，而是启示录。活着的思想家別无他事可做，只有应用这些书籍，为这些书籍作注解，就这些书籍进行爭論，对这些书籍加以引伸，从中寻找出現在世界上的每一种新思想或新事物的根源。布尔什維克的革命沒有解放人类的思想，反倒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严密地把它鎖在一座政治犯監獄之中。在这个叫做辯证唯物主义的达尔文时期以前的地牢里，不可能有思想的翱翔，甚至不可能有詩意的漫步，不可能偷偷溜到門外或向窗外窺視。西方人士根本不能設想，除了这种主观願望的陈腐体系的那些前提和結論以外，对于任何其他思想，苏維埃人的

头脑是封闭得多么严密。就人类智力的进步来说，苏联不啻是一座巨大的道路障碍，这座道路障碍是由那些受过思想教育的机器人来守卫和保护着的，而这些机器人则是在他们称之为学校的机器人制造厂里用血、肉和脑子制造出来的。

在我这个理想的国度里，我对这件野蛮的事情比对任何其他令人失望的事情都感触得更加深刻。我深信，这里面包含着僧侣统治和警察统治的种子。正像一切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指出的那样，任何国家宗教都会导致人的自由的灭亡。政教分立是防止暴政的主要措施之一。但是，马克思的宗教却使这种分立变成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它的教义就是政治，它的教会就是国家。在它那些教条的范围以内是没有希望朝着它所许诺的自由社会演变的。

由于这些原因，我没有撰写人们希望我写的有关“苏维埃领导下的生活”的旅行札记，而跑到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阅览室去，安下心来撰写我原先开始了的一本书即《走向自由，前进的方法》的未完成部分。虽然我沒有錯誤地认为我会很快地引起人们的注意，我还是觉得，向这个道路障碍进攻是我对革命的责任，因为它是以最高智慧的形象炫耀于人们面前的蠢笨的怪物；我要用唯一可能的方法向它进攻，就是无可辩驳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方法之间的矛盾。

我在俄国逗留了一年零九个月，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俄文和阅读布尔什维克采取行动时所依据的那些基本读物，这些读物大多是用俄文写的。我在1924年6月离开俄国，在西欧度过了三年，在那里完成了一本有关这个问题的书，名为《马克思和列宁，革命的科学》(Marx and Lenin, the Science of Revolution)。这本书于1926年在伦敦出版。那时候，盎格鲁-萨克逊世界对马克思的理论没有什么兴趣，我为了出版这本书，不得不先垫出钱来。但

是，艾伯特(Albert)和查尔斯·博尼(Charles Boni)收买了尚未装订成书的印张，一年以后在纽约出版了这本书。翌年，《法国新评论》出版了这本书的法译本。我在金钱方面的投资，卓卓有余地收回了。但是，我在摧毁俄国的这个道路障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却并不显著。我寄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那一本被邮局退回来了，上面注明：“经出版局审查，不得入口”。从俄国发出的唯一的微弱声音，是来自伟大的科学家伊凡·巴甫洛夫(Ivan Pavlov)，他使我很惊奇，竟然亲笔写了一封信，毫不畏惧地通过邮局寄来，他写道：“我完全同意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批判。”他还说了以下的话，帮助我从社会主义痛苦而缓慢地恢复过来：“革命的科学是没有的，在很长的时期内也不会有。有的只是那些具有包罗万象的坚强常识的人的生命力在暗中的摸索，而且有几分是由经验来指导的。我们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细节上对我们的思想和道德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我认为这个革命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在文明世界的任何地方以这种形式重演(我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的时代错误。这就是我对这些事情的最深刻的理解。”

在那本书里，我是做为一个相信苏维埃制度的人来写作的，我依然认为，列宁朝着实验科学的态度迈出了一大步，虽然是不自觉的，我拿他来和他那些更为正统的对手做比较时，称他为“革命的工程师”。这种说法当中有很多的道理，但我还是设法回避了它的含意。我认为，列宁以马克思对阶级力量的分析为依据，终于在整個俄国社会上面撒下一张网，把政权以及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政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是一件了不起的和有希望的事情。

这个理论上的概念牢牢铭刻在我脑子里，尽管我在离开俄国以前就已经看到我现在认为是这个革命直接的和必然的结果的那种现象，即政权被一个并不真正喜欢人们的各种权利的暴君篡夺

了。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为了使自己成为主人而施展的阴谋，我不但看见了，而且还仔细研究过。除了研究斯大林的策略以外，我还参加了1924年5月的党代表大会，斯大林在那次大会上进行了公开的攻击，托洛茨基在党内的威信被摧毁了。在那次代表大会的幕后，托洛茨基悄悄地对我述说了那份没有公开的名为“列宁遗嘱”的文件的要旨和主要细节。几天以后我就要离开俄国，在托洛茨基的鼓舞下，我把那几天的时间用来搜集我所需要的其他一些文件，以便揭发这个阴谋并加以解释。为此，我把那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放在一边，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列宁逝世以后》（Since Lenin Died）；我认为，这本小册子现在仍然是列宁逝世后争夺领导权的真实史料。

在我的社会主义见解的演变过程中，那本书只是小小的一步。我当时的结论只是提出一个警告，叫其他国家的革命者不要以列宁主义的名义承认“一个集团的国际权威，列宁的遗言是不利于这个集团的警告，而他们用不公开列宁的主要文件的方法来保持这种权威的”。我竟然要经历十四年的时间，才看出这个集团不仅仅是列宁计划的敌人，而且也是列宁所设想和制造的革命的结果。

然而，我在那两本书里说的话，已经足以使我完全被排斥于正式的共产主义运动之外。我在1927年从欧洲回国时，那些政治上的老朋友在街上遇见我，大多不愿意跟我说话。在共产党人看来，我是叛徒、变节分子、流氓、真正的贱民。随着敌对气氛的增长，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整个激进的知識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感染了整个自由主义的知識界。为了抹煞我所说的事实，人们当然很快给我牢牢地戴上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尽管我既不同意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也从来不像别人那样幻想他会成为一个政党的

成功的領袖。托洛茨基捍衛過列寧的政策和布爾什維克原來的目的，這個事實在我那本小冊子里是說得明白無誤的，我相信，如果真實的歷史能夠保存下去，這個事實在歷史上也將是明白無誤的。但是，我並不矢忠於任何領袖或集團。我依然矢忠於工人階級，矢忠於通過階級鬥爭取得進步這種主張。在原則上，我只是向國際工人階級及其領袖提供明智地進行鬥爭時所不可缺少的情報。

我本着同一個目的，在1928年翻譯和出版了流亡國外的俄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被禁止了的綱領和文件，書名為《俄國的真實情況》（The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由於原文是他們的而不是我的，我便把版稅交給那時已經在美國成立起來的托洛茨基反對派的一個小支部。這加深了人們的印象，越來越認為我是托洛茨基的親信，儘管我個人關於他未能採取手段戰勝斯大林的那些想法，絕對不是一個信徒所應該有的。^① 我所捍衛的一向不外乎是列寧的政策和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真相。我把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翻譯出來，是心懷欽佩，而不是表示贊同。我認為，那本書把馬克思的形而上學絕妙地和極其令人信服地應用在歷史上，遠遠超過馬克思本人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不過，我想這恐怕是最后一本書了。再也不會有哪個巨人願意花費這麼大的腦力把種種事實硬套到這些格式里面去。

在我個人的發展中——如果不是智慧的發展，那也是感情的發展——一本標誌着我邁出較大一步的書，是我在1932—1933年寫成並在1934年出版的《穿制服的藝術家》（Artists in Uniform）。書中我描寫了在斯大林的皮鞭下在文學和藝術方面建立起來的可

^① 我在《我所知道的英雄們》（Heroes I Have Known）一書的《疾風勁草》（Great in Time of Storm）一章中敘述了這些想法。

① 我在《我所知道的英雄們》(Heroes I Have Known)一书的《疾风劲草》(Great in Time of Storm)一章中叙述了这些想法。

在我个人的发展中——如果不是智慧的发展，那也是感情的发展——一本标志着我迈出较大一步的书，是我在1932—1933年写成并在1934年出版的《穿制服的艺术家》(Artists in Uniform)。书中我描写了在斯大林皮鞭下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建立起来的可

面去。

有哪个巨人願意花費这么大的腦力把種種事實硬套到這些格式里方面所作的努力。不过，我想这恐怕是最后一本书了。再也不会妙地和极其令人信服地应用在历史上，远远超过馬克思本人在这怀欽佩，而不是表示贊同。我认为，那本书把馬克思的形而上学絕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翻譯出来，是心是列宁的政策和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我把托洛茨基的《俄些想法，绝对不是一个信徒所应该有的。①我所捍卫的一向不外乎洛茨基的亲信，尽管我个人关于他未能采取手段战胜斯大林的那反对派的一个小支部。这加深了人們的印象，越来越认为我是托不是我的，我便把版权交給那时已經在美国成立起来的托洛茨基实情况》(The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由于原文是他們的而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被禁止了的綱領和文件，书名称为《俄国的真我本着同一个目的，在1928年翻譯和出版了流亡国外的俄国

工人阶级及其領袖提供明智地进行斗争时所不可缺少的情报。忠于通过阶级斗争取得进步这种主张。在原則上，我只是向国际但是，我并不失忠于任何領袖或集团。我依然忠实于工人阶级，真实的歷史能够保存下去，这个事实历史上也将是明白无誤的。的，这个事实在我那本小册子里是說得明白无誤的，我相信，如果成功的領袖。托洛茨基捍卫过列宁的政策和布尔什維克原来的目

成为泡影。我只知道，在1933年里，这些肯定的怀疑变得非常强烈，使我不再发表拥护苏联的言论，并在大约两年的时间內一直保持缄默。1936年春天，我写了一篇题目叫做《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终结》（The End of Socialism in Russia）的文章，在1937年1月号的《哈波斯》杂志上发表，后来由李特尔、布朗公司印成单行本出版。我在那本书里說道：“我认为在当前的俄国，已經沒有希望实现沒有阶级的社会了。”但是，我仍旧把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专政看做是列宁政策的敌人，而不是它的結果。

又过了两年我才認識到，这要由列宁的方法来負責，換句話說，也就是要由布尔什維克的馬克思主义来負責。我認識上的这一繼續前进的緩慢步驟，記錄在1939年出版的另一本书里，书名为《斯大林的俄国和社会主义的危机》（Stalin's Russia and the Crisis in Socialism）。

我在那本书里写道：“我現在认为，列宁为了超民生的目的而創造出来的这种夺取政权的卓越方法，已經表明是和目的根本冲突的。我认为，由少数人的組織严密的政党用武力夺取政权，无论它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用‘罗马荣誉’的名义，用‘北欧人至尊’的名义，或是用其他任何可以想得出来的口号，而且无论它是多么巧妙地和人民群众結合在一起，一般都会导致极权主义国家的产生。‘极权主义国家’只不过是暴政的现代名称。它是采用现代办法实行的暴政。这种办法的实质是，把学校教育机器——列宁主要依靠的正是这种东西的推动作用——顛倒过来使用。”

这个思想转变使我在《馬克思和列宁，革命的科学》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里所說的話大多被否定了。而且，自从那本书在1926年出版以来，我对于馬克思主义又有了許多新的認識。那本书中对于馬克思的整个思想方式的不科学的和簡直是迷信的特征的論

证，随着苏维埃和西方文明之间斗争的日益发展，似乎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那本书是我对这个斗争的最大的贡献，我把那本书重新写了一遍，尽我的能力写得成熟一些，仔细一些。同年即1940年秋天，该书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吗？》(Marxism Is It Science)这一书名出版了。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虽然不赞成列宁的政党控制的制度，却并没有断定“社会主义的假设”已经被证明不能实现。这种判断，或者说面对这个事实的内在力量，是在第二年形成的。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确记住了确切的时刻。在弗雷达·厄特利^①举办的一次鸡尾酒会上——我想大概是为她的朋友伯特兰·罗素举办的——大家谈到由俄国传来的一些最近的相当可怕的消息，她突然问我：

“撇开俄国这些情势不谈，你还相信社会主义的主张吗？”

我说，“不。”

虽然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这个答复却发自心灵深处。一旦这个问题被大胆地提出来，似乎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如果社会主义的假设一般来说能够成立，那么，当俄国资本家受到剥夺，生产由国家接管的时候，情况无论多么不顺利，社会主义的假设所许下的那些好处总也该出现一星半点。可是，到那时为止，从社会主义理想的观点来看，俄国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比处在沙皇统治下的时候更加糟糕。我不需要更多的像纳粹德国或英国那样的试验，或其他国家的明显的趋势，来使我相信这一点。我确信，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使下层阶级得到自由、公道、平等或任何其他文明准则的一整套想法是骗人的梦想，是经过一个多世纪才破灭的

^① 弗雷达·厄特利(Freda Uteley, 1898—)，英国作家，1938年曾来中国，现居美国，著有《日本的泥足》(Japan's Feet of Clay, 1936)、《战时的中国》(China at War, 1939)等书。——译者